

新泉整训孕育《古田会议决议》

□ 褚 银 章世森

1929年11月的一天，闽西山
区霜色凝重，寒意袭人。宁静的山
谷里，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刚
从上海日夜兼程返回红4军的陈
毅，在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
共中央指示精神后，即派人将中央
“九月来信”送给正在福建上杭休
养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亲笔
信，促请毛泽东回到红4军前委领
导岗位。

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
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部长谢汉秋
陪同下，从上杭动身赶回长汀。一
病数月，毛泽东此时并未完全康
复，但在见到朱德、陈毅后，他十
分高兴。28日，他主持召开了红4
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针对红
4军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
问题，会议发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
地、建立闽西政权的建议，并根据
中央“九月来信”关于“红军有好的
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
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的指示，
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
内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军事素
质。会议还规定12月份的主要工
作是：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
大会，建立红4军的政治领导，纠
正红4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

当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
报告自己返回红4军的情况和目前
的工作计划：“四军党内的团结，
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
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
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
须赶急进行教育。”随即，毛泽
东、朱德、陈毅等开展调查研究工
作，召开座谈会，同时开始构思九
大决议。

12月3日，国民党赣军第12师
师长金汉鼎率部由赣入闽正向福建
长汀袭来。为避免正面作战，毛泽
东、朱德、陈毅等率红4军第1、
第2、第3纵队撤离长汀开往新
泉，与第4纵队会合，全军达到
4000多人。

新泉地处福建省连城县南部，
由西、北、东南3个村庄组成，东
西两侧山岭重叠，连绵起伏的高山
构筑成东西两道天然屏障，西连长
汀南阳，南接闽西苏区中心地带古
田。红4军要到新泉的消息很快传
遍镇子大街小巷，苏区群众欣喜万
分。红4军以纵队为单位，分散驻
扎在附近乡村。前委、军委机关设
在“望云草室”，毛泽东、朱德、
陈毅等住进这座砖木结构、风格典
雅平房。

究竟从哪里着手解决红4军党
内存在的问题？如何才能把第九次
党代会开好？时任第1纵队参谋长
萧克后来回忆道：“为开好这次
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齐心协



毛泽东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 秦长安作

力，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毛泽东
亲自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听取群
众对红军的意见；然后又召开各支
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一
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
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
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这些
问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的办法。”

在“望云草室”，毛泽东主持
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预备会，研究部署整训运动。整训
分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政治整训
由毛泽东和陈毅主持，军事整训由
朱德主持。这次为期10天左右的
军事、政治整训，史称新泉整训。

政治整训旨在明确红军的主要
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纠正旧军阀作风。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的工作，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
治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整训一开
始，毛泽东便深入基层开展周密细
致的调查研究。开会时，他采取调
查和讨论的方法，向出席者提出各
种问题，比如：打骂士兵的制度行
不行？流氓主义思想对不对？为什
么不行？用什么方法来纠正？会议
中往往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展
开激烈争辩，毛泽东或耐心解释某
个观点，或详细列举一些事例，引
导大家讨论。

除了在红军内部做调查，毛泽
东还步行至新泉附近的官庄召开农
民座谈会。这些农民并不十分理解
红军的革命理论和治军条令，但他
们懂得田里的收成和军队对待他们
态度的好坏，知道他们的利益是受
到损害还是得到保护。他们从红军
打土豪、帮助农民分配土地和收割
庄稼，讲到苏维埃政府如何由农民
当家作主，也讲到他们不满意的地
方……经过10余天的军内和农村
调查，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4军
内部存在的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
源，为解决问题收集了第一手材料。

此外，毛泽东还领导红4军开

展了思想教育活动，探索政治建军
的路子。他告诉广大党员干部，红
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
装集团，绝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
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
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
命，否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
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隆冬之夜，“望云草室”经常
彻夜透出亮光。毛泽东靠窗伏案而
坐，在一盏小煤油灯下，时而凝神
沉思，时而挥笔疾书。“关于纠正
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
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
治训练问题”……八个章节独立成
文又相互关联，每个章节后面再分
小节，列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
并写明存在问题的原因、纠正的方
法和措施。就这样，一份长达3万
字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
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案》草案诞生了。

军事整训方面，朱德抓住培训
基层军事指挥员这个直接影响部队
战斗力的关键环节，举办了基层军
事干部训练班，主持制定了红军各
种条例、条令，并亲自授课，言传
身教。指战员按照游击战争的实践
要求，进行各个课目的演练，红军
战斗力有了较大提高，部队面貌焕
然一新，为古田会议后红军战争的
胜利发展打下基础。正当新泉整训
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国民党赣军第
12师从长汀扑过来，并向连城新泉
方向推进。

一个寒冷的夜晚，第4纵队党
代表张鼎丞匆匆赶到“望云草
室”，向毛泽东报告敌人已向新泉
进逼的消息，朱德、陈毅也闻讯赶
来。“瓜熟蒂落，党代会还是要开
的。我看快速移师古田，在那群山
环抱的红色区域中心稳稳地开它三
天会，到时再跟敌人周旋如何？”
“好，明天就命令部队急行军赶到
古田。”朱德、陈毅都赞同。为了
排除干扰，开好红4军“九大”，

毛泽东、朱德、陈毅决定：红4军
除留下一部分在新泉警戒长汀来犯
之敌外，其余移师上杭县古田，继
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为召开党代
会作准备。

红4军到达古田以后，毛泽
东、陈毅带领的前委机关和政治部
入驻八甲村的“松荫堂”大院，朱
德和司令部入驻“松荫堂”对面一
座有着浓郁客家风格的青砖大院。
在这两个大院里，毛泽东、朱德、
陈毅等继续为召开红4军第九次党
的代表大会进行各种准备。

随着工作不断深入，毛泽东开
始就红军存在的问题分组进行专题
研究。白天，他主持召开党代表联
席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晚上，则在
“松荫堂”整理调查得来的材料，
继续修改和完善九大决议案。从新
泉的“望云草室”到古田的“松荫
堂”，通过大量调查、座谈，毛泽
东对红4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
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产生的根源
以及纠正的办法，已有了全面透彻
的理解和把握，九大决议案得到进
一步完善。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
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
充分准备，在古田曙光小学胜利召
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在新泉
“望云草室”酝酿起草的《中国共
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
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
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
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红军建设
的根本原则。决议不但在红4军得
到贯彻落实，其他各红军部队也照
此执行。从此，这个决议成为我党
我军政治工作行动的纲领指南，使
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新泉整训虽然只有短短10余
天，但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它是继三湾改编之后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
次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整训，是
一次新型民主整军运动，是我军政
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为
彪炳我军军事史册的古田会议的胜
利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
备。由于《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手
材料的收集和草稿的孕育起草都是
在新泉整训过程中完成的，曾有专
家比喻说：古田会议的召开是决议
的“一朝分娩”，新泉整训是决议
的孕育起草和形成的“十月怀胎”。

（摘自2021年12月26日《解放
军报》）



刘少奇从小就特别喜爱读书，把学
习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
形象地称呼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
期间，刘少奇一直把学习抓得很紧。曾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
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
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当时一
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少奇同志几
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
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
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
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尽管身兼数
职，工作更加繁忙，但他对自己的学习
仍然抓得很紧。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
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
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
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
进了行李包，休假期间整天在屋里埋
头攻读。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
有时他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
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假
期结束时，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简
编》

刘少奇的读书故事

□ 彭明剑

也被刘少奇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
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
的一种生活状态。

（摘自2021年第8期《湘潮》）

吴运铎：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 翟佳琪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部风靡全
国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
出版10年间就陆续印刷了1000多万
册。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和主人公，就
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
兵工功臣——吴运铎。

1917年，吴运铎出生在江西萍乡
一个煤矿职员家庭。在机器轰鸣声中
长大的他，从小就对机械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工人，
造机器、开机器。

大革命失败后，父母所在煤矿陷入
半停顿状态，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职工子
弟学校也被迫关闭。吴运铎一家人失
业又失学，生活陷入绝境。为了谋生，
14岁的吴运铎便下煤窑做苦工，后
来又辗转做过电工、钳工、铸工、水
泥工，步步艰辛，境况却没有半点好
转。

全国抗战爆发后，吴运铎在《新华
日报》的影响下，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1938年，他离开武汉，远赴皖南云
岭，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皖南云岭开始，吴运铎便投入到
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人民兵工业事业中，
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
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大连联
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
厂长、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主持了多项兵器科研项目，培养了大
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
队装备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
地的兵工生产困难重重。土造的锻铁
炉、木头做的风箱……整个兵工厂找
不到一部像样的机器。吴运铎和同志
们想方设法，因陋就简，从没爆炸的
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中挖火药做原料，
用民兵破路挖来的铁轨、道钉改造车
间里的钢

镗、旋刀、钢模，用长凳、木桩、木
板、石磨造出了旋床、打光机、发动
机等土机器，扩大了枪弹生产规模。
面对敌人的“扫荡”，兵工厂的工
人们常常要抬着机器打游击，在战斗
间隙马不停蹄地开展生产，供应前线。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只读过5年小
学的吴运铎还是啃下了《工程设计》
《机械原理》等书，设计出一张又一
张机床图纸，和战友们一起建立了子
弹厂，成功研制出拉雷、电发地雷等
多种武器弹药，为提高部队火力作出
很大贡献。

生产研制武器弹药的危险性有目共
睹。吴运铎在工作和战斗中曾多次负
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
经历手术20余次，但身上仍留有几十
块弹片。面对危险与伤痛，吴运铎然
无畏，以顽强的毅力一次又一次战胜
病魔，回到生产一线。他说：“个人
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
是只要我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
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

1951年10月，吴运铎被授予特邀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在同志们要求的
下，他把自己的经历和事迹写成了长
篇文章《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并
在《工人日报》上连载，后来以《把
一切献给党》为名出版，在社会上引
起强烈反响，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在
国外广泛传播。

离休后，吴运铎依然心系党的事业，
参与了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北京
病残青年俱乐部的有关工作，为青少
年和残疾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在北京
病逝。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把一
切献给党”的诺言。

（摘自2021年第10期《党建》）

在延安的幼儿抚育机构中，洛杉
矶托儿所名气很大。很多人都想不到，
延安居然有这样一个以美国城市命名
的托儿所。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
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中央托儿所。

据丑子冈的女儿李文芳回忆，“最
先提议办托儿所的，是当时的中央总
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

傅连璋，有“红色华佗”之称的
医疗将军、开国中将。他在瑞金时期
加入红军，把自己的医院和全部家产
都捐给了革命事业，创办了红军的第一
所正规医院。长征中，在极端艰难困
苦的条件下，以他的妙手医术保证了
大批中央领导、战士的健康。

彼时，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已
经迁往安塞一年多了，延安一时没有
保育机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出生
的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带在身边。只
是，他们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
傅连璋很快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并提议开办中央托儿所。毛泽东对此
也是感同身受，身边的女儿李敏（娇
娇）出生于1936年，同样是无暇照
顾。他对傅连璋说，这是件大好事，
要尽快办，“托儿所办起来，就让娇
娇第一个报名。”

1940年春天，在距离中央驻地杨

家岭很近的兰家坪山上，建起了延
安中央托儿所，由曾经主持扩充建设
延安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冈任所长。
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有原为中央书记
处住所的几孔窑洞，第一批只接收了
七个孩子，他们是毛娇娇（李敏）、
罗小金（李铁映）、贾丽丽、谢丁
丁、陈小胖、王苏云和傅维方。后
来，接收的孩子不断增加，在前线与
日军作战的将领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
来延安，其中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
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
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

刘太行1939年出生于太行山，
1940年10月，徐向前从山东去延
安，途经太行山，刘伯承就委托徐向
前把刘太行带到延安，说：“你把太
行交给总书记就行了。”
刘太行就这样到了延安，起初由

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

□ 董少东

康克清照顾。康克清同样公务繁重，
只能从延安女子大学找了个“小鬼”
——年仅15岁的王茜平，托她照应
一段时间，再送到中央托儿所。

王茜平见到刘太行，差点哭出了
来——小娃娃非常虚弱，大大的脑袋，
胳膊、腿细得像四根火柴棒，快两岁
了还不能走路。谁能想象，战场上叱
咤风云、威震敌胆的刘伯承将军的孩
子，居然营养不良到如此程度。

王茜平悉心照料、调理了半年，
刘太行的身体才算恢复到正常孩子的
模样，这才能进托儿所。康克清看王
茜平细心能干，把她推荐给了丑子冈
担任保育员。于是，一个保育员和一
个新生，一起到中央托儿所报到了。

中央托儿所成立之后不久，便赶上
了抗日战争以来延安最困难的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

民党政府又流露出了“消极抗日积极
反共”的本相，对陕甘宁边区实行
军事包围蚕食、经济封锁。毛泽东回
顾这一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
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
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
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
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严峻的经济条件下，孩子自然是
最优先照顾的对象，边区政府千方百
计保证保育院、托儿所的经费。在公
职人员薪资停发的情况下，保育员的
工资也没有中断一天。但是，极端匮
乏的生活物资经常还要面临断供的困
境。在大生产运动中，第一保育院、
中央托儿所这样的单位，也开荒种粮
种菜，养鸡养羊养猪，这才逐渐保证
了孩子们每天的肉蛋奶。

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

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
同盟”名义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
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募捐
到一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
用品。这些物资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
事处，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为了感
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
中央决定将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
托儿所”。

这个新名字让托儿所的孩子觉得
新奇。丑子冈的女儿丑松亮那时也在
托儿所里生活，她回忆说：“我们不
知道洛杉矶，知道有‘落汤鸡’、烧
鸡，就猜洛杉矶应该是‘落山鸡’。
真的孩子好奇地向保育员阿姨询问：
“‘落山鸡’是什么鸡？”惹得阿姨
哈哈大笑，告诉大家那是美国的一个
地名。

此后，宋庆龄想方设法给予医药
及营养食品等援助，甚至还送来了一
台大磅秤。

以前，不要说托儿所没有磅秤，
甚至整个延安也没有这种稀罕物。托
儿所的孩子们量体重，都要把称粮的
大秤借来，同时，还要搬来一只大柳
条筐。碰上个淘气的孩子，忙得满头
大汗也测不准。

这台大磅秤不仅能称体重，还能
测身高，十分准确，在托儿所可派
上了大用场。有一次，毛泽东到洛
杉矶托儿所来看望孩子们，他得知这
台大磅秤是宋庆龄送来的，便兴致勃
勃地踏上了测量体重，并高兴地说：
“哎，鸟枪换炮了嘛！”

洛杉矶托儿所是在宋庆龄的关心
爱护下筹建起来的，她说：“我们已
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
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
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

（摘自2021年11月2日《北京
日报》，原标题为《圣地摇篮——
烽火硝烟中的延安保育院》）

